

吴绮云 / 著

闽南族谱中的 南洋族裔

*Minnan Zupu Zhongde
Nan Yang Zuyi*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闽南族谱中的南洋族裔

吴绮云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闽南族谱中的南洋族裔/吴绮云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108-5461-3

I. ①闽… II. ①吴… III. ①华侨-历史-东南亚
IV. ①D634.3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44041 号

闽南族谱中的南洋族裔

作 者 吴绮云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福州报业鸿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7.75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5461-3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承蒙以下项目经费资助：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闽南文化研究
基地（泉州师范学院）

泉州市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闽南地区南
洋华裔族群谱牒文献研究”（2017D27）

本书系泉州市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闽南
地区南洋华裔族群谱牒文献研究”（2017D27）
的研究成果

序 言

族谱是记载同宗共祖的血缘集团世系人物和事迹等方面情况的历史图集，是以特殊形式记载的家族发展史，它与方志、正史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历史大厦的三大支柱，是我国珍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历史上的闽南，各个家族向来极为重视修谱，明清时期以来，更是修了大量的家族谱牒。这些家族谱牒，作为闽南各个家族生成生长的文字见证，家族支分派衍的历史记录，既是闽南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于研究南洋华侨华人历史，对于南洋华侨华人寻根认祖，有着极为重要的特殊价值。

闽南是中国最著名的侨乡之一，是南洋华侨华人最主要的祖籍地之一。历史上的闽南地区，尤其是明清时期以来，各个家族大批族裔前往南洋谋生，许多族裔最终定居于南洋，在南洋各地繁衍生息。闽南洋洋大观的族谱中，随处可见族裔在南洋的记载。通过对族谱中所记载的大量南洋族裔信息的梳理，可以清晰地看出，族裔为何背井离乡前往南洋，他们是怎样迁移南洋的，他们到了南洋后如何历经磨难，他们在南洋如何顽强拼搏，他们对南洋社会所作出的贡献，以及如何始终保持对故土家园的深厚感情，等等，并可以从中得出许多重要的启示。

正因为闽南族谱具有这种特殊价值，因此，加强闽南族谱的收集，加以认真梳理，深入研究，充分发掘利用，无疑是很有现实意义的重要工作，亦是“一带一路”战略推进的要求。这对于南洋族裔寻根谒祖，弘扬慎终追远的传统情怀，对于凝聚南洋族裔心力，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贡献，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也正是撰写本书的基本动机。

目 录

第一章 谱载族裔向南洋的迁移.....	1
第一节 唐五代到明朝的迁移.....	1
第二节 清初至鸦片战争前夕.....	16
第三节 鸦片战争至民国时期.....	39
第四节 迁移特点及形成原因.....	59
第二章 谱载族裔在南洋的拼搏.....	74
第一节 族裔在南洋的苦难遭遇.....	74
第二节 族裔在南洋的互帮互助.....	86
第三节 族裔在南洋的顽强拼搏.....	97
第三章 谱载族裔对南洋社会的贡献.....	126
第一节 族裔逐渐融入南洋社会.....	126
第二节 族裔对南洋政治经济贡献.....	144
第三节 族裔对南洋社会公益贡献.....	160
第四章 谱载族裔祖家祖国情怀.....	182
第一节 族裔传承祖地家族文化.....	182
第二节 族裔与祖家的密切联系.....	196
第三节 族裔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241
参考文献.....	265
后记.....	275

第一章 谱载族裔向南洋的迁移

众所皆知，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的福建闽南地区，亦即泉州、漳州和厦门，由于距离南洋地区较近，历史上诸多家族有大批裔孙前往南洋地区，许多人最终在南洋各地定居繁衍，闽南亦因此成为南洋华侨华人最主要的一个祖籍地，成为全国著名的侨乡。以泉州为例，据2014年统计，全市有七百五十多万祖籍泉州的华侨华人，分布在世界五大洲一百二十九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百分之九十居住在南洋各国。闽南家族裔孙向南洋地区迁移，从时间上看，至少从唐代就已经开始，自此而后，历经五代、宋、元、明、清，绵延至近现代，可谓上下越千年。闽南族裔为何迁移南洋？如何向南洋迁移？迁移主要集中在哪些时段？前往南洋后主要分布在哪些地方？这种分布有什么特点以及形成的原因又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从闽南民间社会蔚为大观的家族谱牒中，可以找到许多的答案。

第一节 唐五代到明朝的迁移

一、唐五代到宋元时期

闽南地区家族裔孙出洋谋生的历史源远流长。闽南地处福建东南沿海，隔海与南洋群岛的菲律宾等国家相望，交通便捷的地理位置，使闽南

族裔向外移民拓展，主要指南洋地区。从闽南沿海乘坐帆船往南洋，尽管也要几个昼夜，然而，这对于以海为生的闽南沿海家族族人来说，并非什么难度很大的事。闽南沿海各个家族的族人，自古就练就出超凡的驾驭海洋波涛的本领，有着甚为高超的扬帆出海的能力，有所谓“习于水斗，便于用舟”的传统。闽南沿海，港汊繁多，天然港口遍布，泉州就有蚶江、石狮、祥芝、永宁、深沪、福全、围头、东石、安海、后渚、石井、崇武、金门料罗、金角尾等港口，漳州有月港、浯屿、镇海、井美、佛昙、赤湖、旧镇、陆鳌、古雷、铜山、沃角、宫口等港口，厦门亦有曾厝安、白石头、大担、南山边、刘五店、青屿、赤码、槟榔屿等港口。这些港口，都是很好的登舟之处，都是驶往南洋的重要出发点。即使没有这些港口，沿海各个乡村的家族裔孙，凭着颇为先进的造船技术和高超的航海技术，依借帆船甚至渔船也可以自由航渡。南海虽然波涛汹涌，可对于为生活所逼迫而又熟悉海上航行的闽南族裔而言，基本不在话下。

唐五代时期，闽南地区经济迅速繁荣，造船技术已颇有水平，泉州港已崭露头角，呈现出“市井十洲人”的繁荣景象，海外交通日益发达，为各个家族的裔孙出洋谋生提供了有利条件。唐朝后期至五代时期，闽南濒海地区人口稠密，可耕地较为稀缺，人稠地狭的矛盾已经开始显现。沿海许多家族的裔孙，为着生存和发展，不能不走出家门，开始沿着海路外出谋生，前往南洋经商，甚至移居南洋者大有人在。这些族裔实际上是远古时代越人进入南洋的继续，他们或自发或个别或少量地前往南洋，最后应当都融入南洋地区先住民的群体之中，以至福建被南洋人称为唐山地。

唐代，闽南家族裔孙跨出国门，漂洋过海，前往南洋谋生甚至定居，已经络绎不绝，这个历史事实，尽管尚没有发现闽南家族谱牒的记载，然而，从目前南洋已经出土的墓葬以及相关的方志记载，仍然可以从不同角度得到充分的证实。诸如，菲律宾礼智省的马亚辛，发现营造于唐高宗显庆六年（661年）的郑国希之墓。该墓碑记载，郑国希原籍福建南安。这是已知的南洋最早的福建人坟墓。《南安县志》于此亦有相关的记载。晋江《安海志》则记载，唐代南安石井地区人林屡仙，造船通航渤泥，又有名叫王尧的商人，从渤泥运木材来石井，作为造船材料。渤泥即现在的印

尼。这也说明，当时已经有不少闽南族裔前往南洋谋生，从事商业和手工业活动。

唐朝僖宗乾符五年（878年），黄巢起义军挥师南下，经泉州转战广东，曾经驻扎于漳州九龙江畔，当时漳州许多家族不少族裔投奔起义军。后来，起义军在龙溪境内被唐朝官军打败，黄巢率部撤往广东，部分起义军将士下海前往南洋避难，许多漳州籍士兵也随同前往。各个家族中不少以农业为生的破产的族裔，亦跟随而去。阿拉伯人马索提撰写的《黄金牧地》亦记载，他在公元943年航海经过印尼苏门答腊时，曾发现有许多中国人正在那里耕种，尤其是在巴邻邦区域特别的多，这些中国人是因为躲避黄巢之乱而到那里开基的。巴邻邦即印尼的巨港。

唐朝末年，王潮、王审知兄弟率兵据闽，治闽几十年，且兄弟父子相继主政泉州，前后达四十多年之久，对于闽南地区的开发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颇为巨大的影响。尤其是王审知的侄儿王延彬，治泉二十六年间，为了稳定统治，采取了不少有利于社会经济恢复发展的措施。诸如，大力促进对外交通，积极发展海外贸易。《泉州府志》称：王延彬“袭其父封于泉，官泉州刺史，在泉三十年，仍岁丰稔，每发蛮舶，无失坠者，人因谓之招宝侍郎”。据李长富所著的《南洋侨史》载，福建闽南地区是唐代海交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南安陈氏族裔陈匡范，就是利用海外贸易，成为富商巨贾。王延义治闽时，陈匡范当上了国计使，生意更加兴隆，日进斗金，人称“心中之宝”。

五代时期，留从效、陈洪进相继治理泉州。后晋开运元年（944年），留从效出任晋江王，进一步拓展海外贸易，鼓励所属各县到南洋诸国开展商贸活动，陶瓷、铜铁泛于番国。留从效还派人出使占城。随着海外交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闽南各个家族的族裔出国经商的逐渐增多。这期间，闽南沿海有些家族裔孙到南洋谋生后，生意发展了，也有了相当的经济基础，于是，或者与当地异族女子通婚，或者将故乡亲友迁往南洋。《五代史》载：“刘祖安仁，上蔡人也。后徙闽中，商贾南海，固家焉。”据查，刘安仁，河南上蔡人，晚唐随黄巢起义军入闽，最终定居南安，成为当时南安有名的海商。根据考古资料记载，南洋的桑多邦，即闽

南人所称的“山猪墓”，曾经发现有唐代泉州制造的黑瓷器和白瓷器。在南洋的文莱，也曾发现过安溪出产的唐代瓷器。这些事实都表明，当时已有闽南族裔南洋经商或者居住。五代闽国晚期，吏治腐败，弊政百出，闽南族裔更多前往国外谋生，南洋群岛乃是主要目的地。

宋元时期，闽南各个家族的裔孙漂洋过海，前往南洋地区的越来越多，除了交通便捷的地理位置外，尚有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首先，海外贸易更为繁荣。北宋时期，西部少数民族政权兴起，战事连绵，阻断了传统的中西交通要道丝绸之路，因此对外交往贸易逐渐转向南方海路。北宋时期，朝廷于泉州设置市舶司，鼓励进行海外贸易。赵宋政权南渡之后，经济重心随之南移，闽南的开发得以迅速发展，同时亦得以迅速开放，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和繁荣。曾担任泉州市舶使二十多年的赵汝适，在其所著的《诸蕃志》中，记述泉州港到占城（越南南部）、真腊（柬埔寨）、凌牙门（新加坡）、阁婆（爪哇）等地的航行时间，以及福建商人与南洋诸国经商的盛况。宋吴自牧在《梦粱录》中，曾有这样的话：“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自泉州便可出洋。”说明泉州港作为出洋港口的便利。元朝政权统一中国后，也非常重视对外贸易，仍于泉州设市舶司。泉州一度上升为“行省”，泉州港跃居为世界最大港口之一，海外交通更是空前繁荣，出洋人数也随之大量增加。其次，社会经济尤其是造船业发展。自汉晋至五代时期，中原人口多次南迁，大量迁徙到闽南，闽南土地大量开发，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闽南沿海的造船业更是得到长足发展，泉州湾出土的宋代古船，乃是最有力的佐证。唐朝中叶之前，来往于南海等地主要是外国船只的情况，在这期间开始迅速改变。当时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指南针等的使用，大大提高了新造船舶的航海能力，为与南洋的交往提供了技术条件。闽南沿海渔村的家族裔孙，正是依仗先进的造船技术和高超的航海技术，闯出一条“海上丝绸之路”。再次，地狭人稠矛盾愈加突出。闽南枕山临海，多半是山岳和丘陵地带，适宜于耕种的土地不多。诸如泉州，自古以来，被称为“三山六海一分田”的州郡。乾隆《泉州府志》风俗云：“泉州地狭而硗瘠，濒海之邑耕四而渔六，山县田于亩者十之三，田于山者十之七，岁入谷少而人浮于食。”两宋时

期，闽南人口增长甚快，可耕地则非常有限，且土质又恶劣，地狭人稠矛盾愈来愈突出，而土地兼并又非常严重，势官富姓，大肆占田。据《真西山文集》载，王十明知泉州时说：“文肃公居泉，仅有埭田岁租千斛。”这个沿海的地主，有海边埭田田租达到千斤，犹嫌不足，因为还有占田更多的。《泉州府志》“宋乐善”条云：“刘君辅，字仲佐，号西桥，晋江人，生于淳祐间，仕宋主簿。幼失怙，及长，竭力经营。置田南、同二邑，计三十六庄，租八万四千石。外复有山林、地税于祥芝本里。”佛寺道观也霸占田地，有很多寺观田连阡陌。闽南农村经济的趋势，是“有田者不耕，而耕者无田。”拥有土地的农户日少，失去土地只好租种地主土地的佃农日多。官僚地主不仅占田，且隐田匿税，把赋税转嫁到自耕农身上。封建政权则巧立名目，大肆搜刮，赋役繁重，还有“四年而预借五年之税”。各个家族的许多族裔，生活甚为艰难，除勤俭力耕外，还得设法往海外拓殖谋生。宋代惠安进士谢履就有《泉南歌》之作，句云：“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最后，社会动乱。宋末元初争夺泉州港的战争，给闽南社会带来严重震荡。宋景炎元年（1276年），蒙古贵族攻下临安，挟帝北行。陆秀夫在浙江温州奉益王，为帝于福州。元兵入福建，宋帝走闽南。蒲寿庚、蒲寿晟兄弟，杀害在泉州的宗室和淮军几千人，并带了泉州知州田真子献城投降元朝。次年，宋张世杰带淮军、畚军前来围攻泉州，蒲氏派人求救于元朝唆都元帅，元兵来救。由于宋帝进入闽南时，闽南不少家族有族裔响应，组织义兵，参与抗元斗争，何乔远《闽书》“閩巷志”载，“南安人吕七十四，曾黄两姓，各以千人迎景炎帝。”文天祥亦曾在漳州收集残部，并有许多漳州人被招募。因此，元兵占据闽南后，大肆屠杀掳掠。元朝为稳固统治，派遣重兵进驻闽南，先以三千军队驻防，后嫌兵力不足，又增派元军南来。严重的兵灾，极大地摧残了社会生产力，使战后残黎，不能安生乐业，到处满目疮痍，无数人民流离失所。南安《金坑王氏族谱》载：“重公，娶晋邑何氏，生七子，……因宋季元搜杀宋臣子，族众被丁甫焚庐，散处七邑埋名，七子亦相率而去，如晋之上峰、海滨、龙塘，惠之山隔，南之岭头，清溪之芒州等处。”泉州《凤池林李宗谱》云：“元

氏失取，色目人踞闽者，惟吾泉州为最炽，部落蔓延，大肆凌夷，涂炭我生灵。”元末，闽南的元朝统治阶级内讧，发生亦思巴妥兵乱，使闽南大受荼毒。这场兵乱战区不断扩大，双方在闽南进行大混战，兵祸连结，达十多年之久，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被杀死或饿死者不少，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景。泉州府城及惠安县城更是惨遭蹂躏，无数村落化为灰烬。几十年间，连续发生多次的战乱，这对闽南民间家族的破坏很大。泉州《锦田黄氏大宗族谱》云：“当元之乱，盗贼蜂起，吾里为寇所焚，仅存三宅在乡左山之麓，于是吾族或死于盗或终于疾，甚至流离远窜而莫归者难以稽考。”持续的动荡与兵祸，使闽南许多家族遭到毁灭性的摧残，无数族裔流离失所，无以为生，为躲避兵锋，寻求安定生活处所，纷纷逃往南洋，大都侨居菲律宾、爪哇、苏门答腊、占城等地，并终老于异乡。

宋代，闽南族裔到南洋经商者日多，侨居者亦不少。有关这方面的记载甚多。宋代沈括所著《梦溪笔谈》卷二十五载：“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安南人共推闽人李公蕴为主。”李公蕴，晋江东石李家港李氏族裔，早年随兄李淳经商并侨居安南，曾任安南国殿前指挥使，后来创立安南李氏王朝。宋代洪迈《夷坚志》卷三载：十三世纪，泉州人王元懋，“少时祇役僧寺，其师教以南蕃诸国书，尝随海舶诣占城国，国王嘉其兼通蕃汉书，延为馆客，乃嫁以女，留十年而归”。王元懋还让吴大为纲首，率领三十八人，“同舟泛海，一去十载”。1972年，文莱有个穆斯林林公墓，发现一块南宋汉字墓碑，上面刻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景定甲子，男应、甲立。”景定甲子年，即南宋景定五年，公元1264年。据庄为玘教授考证认为，从这个碑文推断，为这位卒葬于此地的“判院蒲公”立碑的两个儿子蒲应、蒲甲，应该是定居文莱的泉州蒲氏家族的裔孙。莆田县西天尾镇，曾发现一块立于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的《祥应庙碑记》，碑文曰：“郡北十里，有神祠，故号大官庙。大观元年（1107年）……次年赐庙曰祥应。谨按，侯官五季时已有初宇。泉州纲首朱仿，舟往三佛齐（今爪哇东部），斋请神之香火而虔奉之。舟行迅速，无有阴险，往返曾不期年，获利百倍，前后之贾于外番者未尝有是。”这也从侧面反映宋代闽南族裔到南洋经商的某些情况。宋代，闽南造船业、制瓷业

甚为发达。据刘安居、陈芳荣所著《南安华侨志》载，宋代，南安石井丁氏家族的丁有财，以及许氏家族的许汉青等人，前往南洋各国进行商贸活动，他们靠航海与南洋诸国做生意，把南安生产的瓷器、铜铁制品、翁绢、布匹、蔗糖等货物运往南洋，又把南洋的木材、香料等运回国内进行销售，成了当时的海商巨富。南宋后期，暹罗国王曾慕名招徕中国工匠。据晋江《磁灶吴氏族谱》载，当时，磁灶吴氏族裔，曾有多人“泛海传艺”。《朱山考略》则称：“南宋时，苏观先生二世孙光国，于咸淳十年随泉州亲戚往苏禄国营生，开苏厝徒夷之始。”宋咸淳十年即1274年。

这期间闽南族裔在南洋的经贸活动，某些考古发现也从侧面作出了证明。1947年、1961年，沙捞越博物馆先后在古晋沙捞越河口山都望发现唐人贸易区、华人墓和大规模铸铁工场等遗址。在双溪查旺、双溪布亚以及沙斑等地，也发现了炼铁炉、铁钉及木炭等等，经炭化测定为距今一千三百一十五年，说明这些地方的炼铁自唐宋以来就一直在进行。有专家认为，这类铸铁工场与闽南同安所发现的古铁矿工场甚为相似。学者郑德坤先生认为，根据常识来推断，这么大规模熔炼出来的山都望铸铁，只有由从北方开来的远洋船队运走，这船队很可能是来自宋明间中国东南部炼铁中心泉州。从以上各种材料可以看出，宋代从闽南往南洋经商或移居南洋的闽南族裔，多数居住在交通比较便捷、贸易比较发达的苏门答腊、爪哇、马来半岛等地，以后才逐步扩展到菲律宾群岛、北婆罗洲等地。

元朝，闽南族裔前往南洋群岛继续增加。晋江温陵董氏家族，宋末元初，族裔董柳轩前往吕宋大明街开族繁衍。据家族所修的《温陵沙堤分派永宁宗谱》载：“十四世，柳轩，开族吕宋大明街。”元朝统治者曾先后九次渡海用兵。元至元三十年（1293年），元朝发兵两万，战船千艘，远征爪哇，正是从泉州港启程。当时，闽南沿海许多族裔被招募为水手、兵勇。后来，元军损兵折将，无功而返，被招募的闽南族裔，有不少兵士留居当地。例如，爪哇的勾栏山，就是元朝兵士滞留居住地。元人汪大渊所著的《岛夷志略》“勾栏山”条云：“有病卒百余人留山中，今唐人与番人丛杂而居之。”荷兰人所著的《爪哇土地和民族》称：公元9世纪至11世纪，在爪哇的福建人甚多。据考察，“闽侨之南来东印度也，较

粤侨为早，元世祖遣史弼南征爪哇时，子弟兵都为闽南籍，后落居爪哇者很多，繁殖也多。”曾经跟随郑和出洋的巩珍，在所著的《西洋番国志》中则说，在爪哇东部的“杜坂”，即华侨称之为“厨闽”的地方，“此地约千余家，中国广东及漳州人多逃居于此”。周致中所著的《异域志》亦云：“元泉州与爪哇杜板之间，每月有定期船舶往还。流寓于其地之粤人及漳泉人，为众极繁。”马欢所著的《瀛涯胜览》“爪哇国条”，也有类似记载：“杜坂番名赌班，地名也。此处约千家，……其间多有中国广东及漳州人逃居此地。”马欢还记述闽粤人移居巨港的情形，“旧港即古三佛齐国是也，……国人多广东、漳泉人逃居于此。”此外，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则有闽南人往帝汶，“往麻逸国、苏禄”的记载。这些人或经商往来于番国，或受雇于他人谋海为生。不少商人更是频繁地往返于南洋各港口之间，他们之中有在当地等待来年季风返航而“住冬”的所谓“行商”，也有因经商需要而“住蕃”“十年不归”的所谓“住商”。总之，当时已有成批的闽南族裔定居爪哇一带。

二、明朝时期的迁移

明朝，旅居南洋的闽南族裔更多。这亦有多种因素的直接作用。明王朝建立后，闽南社会一度出现较为稳定的景象，小农经济也有一定的恢复。然而，这种局面未能维持多久。按《明史·食货志》所载，当时的闽南，可耕地非常缺乏，人口又非常稠密，所以，那些虽然非常坚硬而又十分瘠薄的实在长不出多少五谷杂粮的土地，也都有人在耕种，耕地是如此的珍贵，土地诉讼案件因此特别的多。而且，正如泉州府志所言：泉州不仅土地狭小，且土质坚硬，非常的贫瘠，所以，每年收成的五谷很少。更有甚者，进入正统年间（1436—1449年），明王朝统治日趋腐败，赋税徭役日重，土地兼并也愈益严重，为数不多的可耕地，大量为地主、豪强、官僚、寺院所兼并，使大多数族裔处于无田可耕状态，被迫大批沦为地主的佃农，又受到残酷的压迫剥削。官僚地主不仅竞相兼并土地，且想方设法把赋税负担转嫁到普通农民身上。无地或少地的沿海农民，有的则利用

紧靠大海的地理条件，泛海做私商，把丝、棉、瓷器等物品运载出洋，换取香料等番货及白银，以此作为重要的谋生手段。

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为防止逃亡海上的张士诚、方国珍等反明残余势力卷土重来，也为防范屡屡骚扰东南沿海地区的倭寇，巩固海防，保障海疆安全，很快便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撤销泉州、明州等处市舶司，严格限制对外贸易，禁止私商出海，并且反复重申，“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明王朝推行严酷的海禁政策，严禁私商贸易海外，视正常的海交贸易为走私活动，“片帆不准下海”，导致海外贸易急剧萎缩。然而，这并无法阻止闽南沿海族裔继续前往南洋的行为。因为，失去了土地的大批闽南族裔，有相当部分乃是“资衣食于海”，禁止族裔们依靠海洋进行海内外商品交换，无异于断绝他们的重要生路。各个家族的不少族裔，为了逃避封建王朝沉重的赋税负担，为了维持基本的生计，为了寻求新的生存空间，以及为了博取更大的利润和更多的资财，则必然设法摆脱这种不合理的禁锢。因此，明朝永乐、宣德（1403—1435年）以后，族裔纷纷冲破禁令，冒死出海经商，以各种方式迁移南洋者日渐增多，闽南海上贸易活动兴盛起来，犯禁下海通番现象日趋普遍。万历《泉州府志》云：“石湖、安平番舶去处，大半市易上国及诸岛夷。”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则云：“泉漳两郡商民，贩东西两洋，代农贾之利，比比皆然也。”对这种犯禁泛海经商的行为，明统治阶级采取种种措施严加制止，手段极为严酷。然而，禁越严则反抗愈激烈。因为正如《明史·食货志·市舶》所言：“海者，闽人之田也。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谨存臻，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聚亡命。海禁一严，无所得食，则转掠海滨，海滨男妇束手办，子女财物尽为所有。”张燮在《东西洋考》中叹曰：“大抵闽省纲纪大坏，人人思乱，实在可虑，漳泉亡命，何知三尺。”被迫得走投无路的闽南沿海私商，为了自卫以图生存，他们便配备武装以防备官军的追捕和盗贼的寇掠，有时他们在海上也进行弱肉强食的活动，走上了亦商亦盗的畸形道路。于是正如《筹海图篇》所说的：“嘉靖初，市舶罢……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盗。”明政府把这些亦商亦盗的私商称为“海寇”。当时闽南私商中最负盛名的“海寇”

是林道乾、林阿凤、李旦等。明朝官兵曾追捕过他们。俞大猷曾说过：“海贼林道乾，逃去东南，柬埔寨上山居住，似无复回之理……唯林阿凤亦即所谓‘李马奔’，逃至东南洋，吕宋港中，暂时泊船，势必复回。”明代，泉州有许多家族以“入海而贸夷”而名闻一时，例如晋江安海的黄、杨、陈、柯诸家族。明天启年间，南安郑芝龙异军突起，仅几年间，就成为继李旦而起的海上贸易首领，称雄于明末的福建沿海。

明朝永乐年间，社会逐步稳定，经济也日趋繁荣。明成祖朱棣曾改变政策，恢复因海禁而衰落的海外贸易，发展对外关系，以扬威国外。永乐元年（1403年），诏令恢复泉州、明州、广州市舶司。永乐三年，又于此三市舶司专门设立驿馆，接待来华使者和蕃商。同时，派遣官员出使海外。最著名者，乃是郑和七次下西洋。自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1405-1433年）二十九年间，郑和先后七次率领庞大船队，浩浩荡荡，经太平洋进入印度洋，访问了南洋、印度、波斯及东非等地三十多个国家，有效地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加强了中国与南洋诸国关系的沟通，也有力地推动了大批闽南商人、水手、农民、小手工业者，沿着这条路线到南洋各地经商和谋生。闽南沿海广大地区，无疑与郑和下西洋有密切关系。闽南泉州和漳州，乃是当时重要的造船之地。郑和率船队下西洋时，曾经来过泉州，驻足天妃宫行香，并在泉州地区招募水手、矿工、翻译。闽南沿海诸多家族，大批富有航海经验和具有各种技能的族裔，纷纷被郑和招聘，跟随郑和出使西洋。例如，晋江蒲氏家族的蒲和日，就是被郑和聘为翻译。这些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闽南族裔，某些人在船队到达爪哇巴达维亚、旧港，以及文莱、马六甲等地后，并没有再返回闽南，而且就此留居当地。

明朝中后期嘉靖至万历年间，倭寇猖狂肆虐闽南沿海，前后达几十年之久，成为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对闽南族裔出洋影响甚大。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倭寇船只在泉州浯屿停泊，分别劫掠了惠安、南安的沿海地区。次年，又从晋江龟湖突至安海劫掠。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倭寇在泉州浮桥焚毁民居，又到新桥一带大肆骚扰，造成了乡兵与居民死一千多人之惨祸。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倭寇又攻入惠安崇武城，窃

据四十余天，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同年七月，倭寇攻入安溪县城，也窃据四十余天，把县城内的公署和民房焚毁殆尽。更加严重的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春天，倭寇两次攻陷石狮永宁卫，在那里大肆烧杀掳掠，致使血泊漂尸，死伤积野，连逃入水关内的老百姓，大都被活活堵死，造成了“兵火结，繁华灭”的惨剧。这场惨祸，直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才为抗倭名将戚继光以及知府万庆，提兵施计，将其大量截杀而趋于平息。倭寇肆虐闽南，祸害极为惨烈，闽南社会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沿海地区许多城镇村落化为废墟，数千亩田地变为草莽，满目荒凉，各个家族族裔的生命财产损失难以计数，生灵涂炭，许多族裔破产，沦为无业游民。闽南许多家族裔孙，为了逃避倭祸，纷纷渡海前往南洋定居谋生。

各种天灾的频繁侵袭，使本已生存甚为艰难的闽南族裔，雪上加霜。闽南属丘陵地貌，抗旱抗涝能力很差，古代又缺乏水利工程，大部分地方只能靠天吃饭。闽南又处于沿海，每年都要遭遇几次强台风。所以，水、旱、风灾历来十分严重。此外，还有瘟疫、地震等。明代中期以后，天灾频仍，时疫横行。据乾隆《泉州府志》记载，从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到明毅宗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百多年间，泉州有大水灾十八次，大旱灾十一次，大火灾四次，大风灾七次，震灾二十二次。而且，时有瘟疫。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泉州府城发生大瘟疫，十个人中大约有七个人呜呼哀哉，有的全家无一人幸存，市肆寺观，尸相枕藉，整个府城惨不忍睹，一片凄凉，侥幸活下来的人，谈瘟色变，整天躲在家中，连家门都不大敢出。自然灾害频繁肆虐，使得许多家族成员被迫背井离乡，奔走谋生。

明朝末年，继泉州刺桐港之后，漳州月港崛起，成为中国私商出洋的重要港口，亦是蕃舶来华的主要港口，而当时的广州，朝廷规定，不得发船，也不准蕃国船舶进入。因此，月港成了闽南族裔前往南洋的主要通道。同时，闽南沿海的人口压力，亦越来越大，迁移南洋，变成了族裔的主要选择。于是，闽南族裔前往南洋在明代后期日渐形成高潮，从而揭开了移居南洋的历史新篇章。